

# 国际特赦组织 人物特写

国际特赦组织索引号：ASA 17/032/2014  
2014年6月2日

## 天安门的“被通缉者”：四名激荡人心的活动人士毋忘血腥镇压（一）



1989年6月3日晚及6月4日，坦克驶进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众，造成千百计的人伤亡。

© 支联会

“

*25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的地标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

*在坦克驶进广场以镇压历史上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时，千百计的人在6月3日晚及6月4日遇害或受伤。*

*血腥镇压过后，中国当局公布了“被通缉者”名单，这些人士主要是因为他们示威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中国通缉。*

地面因一排又一排的坦克一齐向前推进而震动不绝，我看见到处都是身穿血衣的民众，我看见受了伤的群众被抬到屋顶上安全的地方以便他们可以到医院接受治疗。待在街上并不安全，因为到处都子弹横飞。

”

沈彤

除了领导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外，当局也针对工人及其他受抗争启发的人士。

本人物特写由两部分组成，本篇是前篇。两名“被通缉者”向国际特赦组织诉说了他们的不平凡故事，并就现今的中国情况分享了他们的祈盼。



沈彤：“我们不敢相信政府会做出这样的血腥暴行”

沈彤在 1989 年的学生示威中是一名顽强的学生领袖，当时只有 20 出头的他早已被许多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同侪视为资深的活动人士。

“大部分人只想要改革，而非革命。我们真心认为自己是爱国人士，我们相信自己实际上是在帮助政府。”沈彤在其纽约的家说，他现在成功经营自己的媒体公司。

中国政府在 5 月 20 日开始实施戒严，当时有越来越多的工人支持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学生。

“政府的嚣张傲慢是主要加剧抗议浪潮的原因，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怀着无比振奋的精神，一些北京市民当时设法堵住军队，不让他们走向天安门。我们的意志无可比拟，我们公然挑衅政府首次试图结束民众抗议的行动。”

“军队受困于北京市内及四周地区，老妈、带着孩子的大妈和工人每天都向军人解说民主运动的目的，告诉他们应该离开的理由。”

“这就是屠杀前的气氛，我们大家都筋疲力尽，但还是活着。”

在镇压当晚，沈彤因为父亲于医院里病重，要回家陪伴母亲，而待在北京老家。

“父亲病重有可能挽救了我的生命，作为儿子，我觉得必须陪伴母亲，否则我肯定会在天安门。”

“我家所处地区邻近长安大街，这里是大部分人被杀所在地方，也是为什么我看到血腥屠杀的开始，看见军人向示威者开火。”

“  
我本来打算待在酒店，却在接待处发现自己在‘被通缉者’名单之列，我躲了两个月。  
”

吕京花

“最初我们以为他们所发的是橡皮子弹，我们没想过军人发射实弹的指称是真的，我们更难以相信政府会做出如此血腥暴行。”



然而，所有军人都荷枪实弹，奉命于6月4日清晨6点前清场。

“地面因一排又一排的坦克一齐向前推进而震动不绝。”

“事件最后终结，我看见到处都是身穿血衣的民众，我看见受了伤的群众被抬到屋顶上安全的地方以便他们可以到医院接受治疗。待在街上并不安全，因为到处都子弹横飞。”

自那夜起，沈彤一直背负着沉重包袱，他说：“我知道这看起来很荒谬，但我就是觉得要为伤亡者负责，这已经缠绕了我25个年头。”

他反复思考学生当时可以采取的不同做法。

“回顾过去，我们着实是太天真，以为这种示威抗议在一个极权国家会带来政权逆转，也不知道界线在那里，我们要重新思考界线所在。”

6月4日过后，沈彤的朋友及其他素不相识的人协助他躲过当局的追查。虽然他在“被通缉者”名单之列，但却能于6月11日毫无伪装地从北京机场离开。他首先登机前往东京，其后转到美国波士顿。

他到达美国后继续学业，同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的人权运动。

1992年8月，他决定返回北京，但抵达后即被拘留，在监狱呆了两个月后，他被遣返美国。

“今日的中国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又最残酷的秘密政党组织，1980年代的中国还较有希望，纵使过去已令人毛骨悚然又让人心生畏惧，也不如今日的残酷不仁。”

“我不在乎官方有否改变怎样定性天安门事件，我们清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成功地将事件昭告世界。”



### 吕京花：“一个又一个在我身旁倒下”

1989 年春天，吕京花在北京经营服装店售衣服来维持生计。每天早上，28 岁已为人母的她都会经过天安门广场，看见学生在抗议示威。

吕京花言辞清晰又语带庄严地说：“我开始感兴趣，就过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非常支持他们要杜绝腐败的诉求，于是给他们送食物和水。”

戒严令开始后几天，吕京花加入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工人自治联盟，正是这个决定改写了她的一生。

“由于我的声音响亮，我自愿做播音员，利用扩音器发布最新消息。晚上，我会睡在广场的帐篷里。”

“我会到工厂作特别公告，呼吁工人前去支持学生。我非常喜欢那段日子，我很开心，那场民主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

然而，在 6 月 3 日她的女儿一岁生日过后，军队开始攻入广场展开清场行动。

“我当时对政府的行动感到非常气愤，所以用扩音器宣布：‘中国政府正试图杀害我们。’我看见民众遇害受伤。当坦克在 6 月 4 日凌晨两点半逼近广场时，我对学生说：‘你们要马上离开，如果你们留在这，就会被杀。’”

“在军队逼近时，我们必须离开。我听见子弹嗖的一声飞过，民众被子弹击中，一个又一个在我身旁倒下。我走呀走，到处闪躲。民众不停大声呼救，呼唤救护车，只是，又有一个人死了。”

6 月 4 日过后几天，吕京花仍沉浸在哀伤中：“我不敢相信政府会试图杀害我们。”

在中国政府公布“被通缉者”名单中，她是 6 名被政府针对的工人中唯一榜上有名的女性。

军队突击她家，把家门踢破了，然后搜查所有房间。他们大声叱喝她的父母，甚至

用枪指吓她的姐姐。

当时她已经躲起来，在镇压一周后离开了北京，辗转到达中国的南部城市广州。



“我本来打算待在酒店，却在接待处发现自己在‘被通缉者’名单之列，我躲了两个月。我与香港那边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助我。我当时思绪纷乱，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如果我不逃走，我会有危险，但我的女儿只有一岁，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她，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决定。但是我要拯救自己，所以最终同意离开。”

吕京花在香港的联络人协助她逃走。在一个暗黑晚上，她与另外 5 人沿河往上游至一条小船，然后转乘高速快艇出海。

她其后成功抵达香港，并在同年 12 月飞往纽约。到达纽约后，她获赋予难民身份。

“后来，我终于能够打电话回家与母亲及女儿通话。我当时在电话里哭得很伤心，我已经 6 个月没见过女儿。我对母亲说：‘我会努力工作，为我的家人、我的女儿创造美好的生活。’”

回忆起远离家人而造成的伤痛时，她的嗓音变的沙哑起来。

1993 年，吕京花试图回国探望家人。她说：“我下机以后被当局堵住，我看见母亲拖着我的女儿在闸口另一边，但是公安不让我们谈话。”

“我只想跟她们问好，但是公安抓着我的手臂踢我，他们把我带走强行塞进原来抵达北京的班机内遣返回美国，让我看不到我的家人。”

她要多等一年多后，至 1994 年 12 月 16 日她的女儿到美国，才能跟她团聚。

她的母亲在 1998 年去世，父亲也于此后一年离世，虽然中国当局出于人道考虑允许十天的签证让她回国奔丧，但是，24 小时十几个人轮流跟踪。

吕京花在纽约继续致力于工人权益，并成为女服业工人工会代表，其后转职为地产代理人。

25 年过去了，她为天安门抗争所取得的成果而感到自豪。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发生过的事，这是我们该做的。当时我还年轻，做过一些事。现在我仍然确信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我依然会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奋力抗争。”

“我当时只有 28 岁，如常地骑着单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注意到我，但之后，人人都想听我有什么要说。”

吕京花清楚知道要对中国政府说什么话。

“我只想政府道歉，为他们在 1989 年的所作所为认错，他们必须就此道歉。”